



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武陵山区特色资源开发与利用研究中心

重庆市协同创新中心：武陵山片区绿色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中国 武陵 文化

ZHONGGUO
WULING
WENHUA

戴楚洲 熊正贤 / 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武陵山区特色资源开发与利用研究中心

重庆市协同创新中心：武陵山片区绿色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中国 武陵 文化

ZHONGGUO
WULING WENHUA

戴楚洲 熊正贤 / 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国武陵文化 / 戴楚洲, 熊正贤著.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8.5

ISBN 978-7-5643-6214-0

I. ①中… II. ①戴… ②熊… III. ①山脉-地方文化-中国 IV. ①K92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11718 号

中国武陵文化

戴楚洲 熊正贤 著

-
- | | |
|-------|-------------------------------------------------------------|
| 责任编辑 | 郭发仔 |
| 助理编辑 | 罗俊亮 |
| 封面设计 | 墨创文化 |
| 出版发行 |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四川省成都市二环路北一段 111 号
西南交通大学创新大厦 21 楼) |
| 发行部电话 | 028-87600564 028-87600533 |
| 邮政编码 | 610031 |
| 网 址 | http://www.xnjdcbs.com |
| 印 刷 | 四川煤田地质制图印刷厂 |
| 成品尺寸 | 170mm × 230 mm |
| 印 张 | 21.5 |
| 字 数 | 341 千 |
| 版 次 |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
| 印 次 | 2018 年 5 月第 1 次 |
| 书 号 | ISBN 978-7-5643-6214-0 |
| 定 价 | 68.00 元 |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8-87600562

目 录

CONTENTS

绪 论	/001
第一章 武陵文化简史	/017
第一节 武陵文化的发生	/017
第二节 武陵文化的发展	/070
第二章 武陵文化内容	/100
第一节 民族文化	/100
第二节 民俗文化	/182
第三节 宗教文化	/218
第四节 红色文化	/228
第五节 旅游文化	/244
第六节 城镇文化	/257
第七节 医药文化	/272
第三章 武陵文化利用	/280
第一节 合力打造旅游文化	/280
第二节 科学开发民族文化	/292
第三节 合理利用宗教文化	/299
第四节 努力繁荣城镇文化	/302

参考文献 /307

附 录 /310

附录一 武陵山片区市州和县区名单 /310

附录二 武陵山片区民族乡名单 /312

附录三 武陵地区茶文化源流考述 /317

附录四 武陵山片区民族文化产业研究 /329

后 记 /339

绪 论

地球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历史文化，人是有文化的高等动物。近代以来，“文化”成为世界各国专家探讨的一门学问，德国诺贝尔奖得主奥斯特瓦尔德最先提出建立独立的“文化学”。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出现中国文化复兴之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党中央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失误。随着思想解放深化，中国学术界兴起了“文化热”，尤其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和区域文化研究热潮居高不下。中国文化界和旅游界专家持续多年的文化研究与讨论热潮，致使“文化学”这门学问成为显学，进而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起到了推动作用。因此，文化也受到各级党委、政府领导重视。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2014年2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一、武陵文化基本概念

（一）“文化”概念的界定

“文化”这个概念内涵丰富，凡是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人类

社会的一切活动及其结果都属于文化。古今中外专家、学者关于“文化”的定义达 300 多种，不胜枚举。西方国家通用的“文化”译自英语 culture，有耕作、栽培、培养、教养之意。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第一次给文化下完整的定义：“人类所创造的精神和物质财富之总和叫做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文化”是中国语言系统中古已有之的词语，西汉刘向的《说苑》最早出现“文化”一词：“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此处“文化”意谓“教化”。南朝梁代萧统主编的《昭明文选》亦载：“文化内辑，武功外悠。”中国近代学者对文化的解释以《辞海》为代表：“文化，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现代汉语词典》关于“文化”的释义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中国大百科全书》认为：“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狭义的文化专指语言、文学、艺术及一切意识形态内在的精神产品。”总之，“文化是个筐，什么都可往里装。”

“文化”这个概念的外延十分广泛，其范围是“与人有关的一切”。文化是大系统，有关文化结构中子系统的划分，学术界存在许多意见。根据文化形态，可把文化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四类。文化涵盖文学、音乐、舞蹈、戏剧、曲艺、杂技、影视、话剧、书法、绘画、雕塑、篆刻、工艺、农耕文化、思想文化、法律乡规、哲学观念、宗教信仰、语言文字、伦理道德、历史文化、图籍文博、名胜古迹、军事文化、教育文化、科技文化、学术文化、医药文化、体育文化、民族文化、民俗文化、礼仪文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建筑文化、交通文化、节会文化、旅游文化、生态文化、山水文化、园林文化、娱乐文化、市井文化、城镇文化、群众文化、商业文化、企业文化等。

“中国（华）文化”是指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在中华大地上创造的文化整体。“中国文化”并非汉族单独创造，而是由中华民族共同创造。“中国文化多元发生说”是具有说服力的观点，中国文化起源于中国本土。越来越多的考古成果证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均有各具特色的土著文化。经过数千年的民族融合，生活在中国境内的 56 个民族共同组成“中华民族”。

“区域文化”是指在特定的自然和地理环境中创造出的带有很深地方特色、民族特色烙印的文化，经过千百年的兼容并蓄、传承与发展形成的区域文明。不同区域由于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不同，又经过长期的历史过程，导致文化背景产生差异，从而形成明显与地理位置有关的文化特征，这种文化就是“区域文化”。200 万年以来，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各个民族在特定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下创造出了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包括关东文化、晋中文化、陕北文化、中原文化、徽州文化、西域文化、秦陇文化、敦煌文化、热贡文化、巴楚文化、巴渝文化、湖湘文化、黔贵文化、闽台文化、闽南文化、岭南文化、大理文化、青藏文化和武陵文化等。春秋战国时期，濮文化、楚文化、巴文化、蜀文化、三秦文化、三晋文化、燕赵文化、齐鲁文化、吴越文化等共同构成纷繁多姿的华夏文化。岁月沧桑，朝代更替，多样性的区域文化世代传承，为中国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区域文化”旅游资源。

（二）“武陵”名称的来历

在中国辽阔的大地上，有座绵延在湘鄂渝黔交界地区的山脉，那就是巍峨的武陵山脉。武陵山脉呈北东向延伸，面积约为 10 万平方公里。武陵山脉是地质史上“地壳运动”造成的，是内、外力共同作用的结果。约在 3.8 亿年前，神秘的地球北纬 30°附近，地壳沉降，武陵山脉位于浅海近岸地带，从河流冲下的泥砂沉入海底。经过若干万年积累，积成厚达千米以上的石英砂岩峰林地貌。

武陵地区是人类起源地之一，是中华文化发祥地之一。武陵地区七处远古时代人类化石揭开人文历史的神圣面纱。原始社会时期，武陵地区原始人群过着渔猎生活，留下许多石器。武陵地区是栽培水稻发源地，还有中国最早的古城“城头山古文化遗址”。

人类语言形成以后，苗族祖先蚩尤后裔和土家族祖先廩君后裔均把共同杂居的巍巍群山称为“武陵山脉”。龙山县里耶镇秦简已有“武陵”一词，指武陵山脉。武陵地区在夏、商、西周和春秋时期尚无政治实体，居民处在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社会中。秦昭王三十年（前 277），蜀郡太守张若攻取楚国巫郡以及江南地区以后设置秦国“黔中郡”。西汉初年，朝廷因武陵山脉而把黔中郡改名为武陵郡，故《后汉书》载：“武陵郡，秦昭王置，名黔中郡；〔汉〕高帝五年更名。”汉代设置武陵郡以后，武

陵山区成为世外桃源。三国时期，武陵郡治所设在临沅县，初属蜀国，后属吴国。吴景帝永安六年（263），分武陵郡西部零阳、充县地设置溇中县，又新建天门郡。武陵郡所辖只剩沅水流域的临沅、吴寿、龙阳、沅南、沅陵、辰阳、黔阳、迁陵、潭城、酉阳等县。西晋时期，武陵郡建置及其所辖地区无大变化。东吴时期，吴寿县恢复汉寿县旧名。东晋著名作家陶渊明创作名篇《桃花源记》以后，诗文大家竞相吟咏桃花源式的武陵源。唐代诗人李白写道：“功成拂衣去，归入武陵源。”唐代诗人王维也说：“居人共住武陵源，还从物外起田园。”宋代文学家王安石在《径暖》中写道：“归来向人说，疑是武陵源。”他们笔下的“武陵源”就是超凡脱俗的世外桃源的代名词。

改革开放以来，澧水流域的有识之士科学开发旅游资源。1984年，著名画家黄永玉最早将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和索溪峪、天子山省级自然保护区命名为“武陵源”。1985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题写“武陵源”三个字。1988年，国务院将武陵源列为第二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武陵源风景名胜区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07年，武陵源风景区获得国家旅游局颁发的5A国家级旅游景区证书。现在，武陵源风景名胜区已被打造成为“国际旅游休闲度假区。”

（三）“武陵地区”的区域范围

“武陵地区”是个泛区域概念，是指以武陵山脉为主线的湘鄂渝黔边境邻近地区构成的一个地理区域。武陵地区地处中国腹地，具有承东启西、连接南北的作用。既是自然地理概念，又是人文地理概念。据班固《汉书》载：汉朝初年，朝廷改黔中郡为武陵郡，共辖临沅县、沅陵县、义陵县、辰阳县、无阳县、潭成县、迁陵县、酉阳县、零阳县和充县等13个县，即今常德市、张家界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怀化市、邵阳市、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宜昌市、黔江区、武隆区、酉阳县、秀山县、彭水县、石柱县、丰都县和铜仁市、遵义市等市（州）的80多个区（县）。2011年10月，国务院国函〔2011〕125号文件《关于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的批复》明确指出：“武陵山片区集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于一体，是跨省交界面大、少数民族聚集多、贫困人口分布广的连片特困地区，也是重要的跨省经济协作区。”2011年11月，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试点启动会议在湘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举行，标志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为主战场的国家新一轮扶贫开发战略正式实施。武陵山片区包括湖南、湖北、重庆、贵州四个省市交界地区的71个县（市、区）。其中，湖南37个县市区（包括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张家界市，怀化市以及邵阳市的城步苗族自治县、新邵县、邵阳县、隆回县、洞口县、绥宁县、新宁县、武冈市，常德市的石门县，益阳市的安化县，娄底市的新化县、涟源市、冷水江市）、湖北11个县市（包括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以及宜昌市的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五峰土家族自治县、秭归县）、重庆市7个县区（包括黔江区、武隆区、酉阳土家族自治县、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丰都县）、贵州16个县市（包括铜仁市及遵义市的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正安县、凤冈县、湄潭县、余庆县）。武陵山片区国土总面积为17.18万平方公里。71个县中有4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13个省级扶贫重点县；有34个民族自治地方县。71个县共有1376个乡镇。2010年末，总人口达3645万人。武陵山片区30多个少数民族人口总计1234万多人，约占全国少数民族总人口的1/8。境内有土家族、苗族、侗族、瑶族、白族、回族和仡佬族等9个世居少数民族。

中国著名文化史专家张正明指出：“北起大巴山，中经巫山，南过武陵山，止于南岭，是一条文化沉积带。古代有许多文化事象，在其他地方已经绝迹或濒临绝迹，在这个地方尚有遗踪可寻。”武陵地区是人类起源地之一。早在远古时代，巍峨雄伟的武陵山脉聚居着“建始人”“巫山人”“长阳人”和“石门人”等人类祖先。先秦时期，武陵地区为濮人、巴人、苗人、楚人和越人等古代民族融合之地。此后千百年来，历朝历代土家、苗家、侗家、瑶家和“民家”祖先留下长达千里、蕴藏“武陵文化”的文化沉积带。

（四）“武陵文化”的区域定位

提出一种区域文化必须考察它存在的时间，必须界定其区域范围。“武陵文化”是起源于武陵地区的传统文化，是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武陵地区”是指以武陵山脉为中心的湘鄂渝黔边境邻近地区。既是历史上的行政区划概念，又是一个自然地理概念，其名称来历有三个方面。

首先，从自然地理看，“武陵”一词源于武陵山脉，是自然地理概念。

武陵山脉是地质史上“地壳运动”造成的，是内外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武陵山脉是横亘于中国中部的重要山脉，是中国自然区划由第二阶梯云贵高原向第三阶梯东南丘陵过渡地区。《辞海》说：“武陵山，在湖南省西北部及湖北、贵州两省边境。东北—西南走向，乌江和沅江、澧水分水岭。海拔1 000米左右，主峰梵净山（2 494米）在贵州省江口县北，富林、矿资源。”198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载：“武陵山，自贵州苗岭分支，行乌、沅二江间，蔓延于湖南省西北境沅、澧二江间，高度达六千余尺，至常德西境之平山（又名武陵山）止，通称武陵山脉。”从现在的中国地形图看，武陵山发脉于贵州省东北部印江、江口、松桃三县交界的梵净山，从西南向东北行，穿过渝东南，主脉成为湘鄂界山。武陵山脉北行过清江、长江，到长江北为荆山；南支经湘西北，余脉延至洞庭湖西。可见，武陵地区地域范围为：湖南省常德市、张家界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怀化市，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宜昌市，重庆市酉阳、秀山、黔江、彭水、石柱等区（县），贵州省铜仁市等地。宜昌市自古以来就是巴人、楚人活动地区，不仅包括长阳、五峰两个土族自治县，而且包括世界闻名的长江三峡部分景点。

其次，从历史地理看，武陵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行政区划概念。龙山县里耶镇出土的秦简中已有“武陵”一词。汉朝初年设置武陵郡后，“武陵”一词成为行政区划名称。据《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载：“武陵郡，汉置，治义陵，在今湖南溆浦县南三里。后汉移至临沅，在今湖南常德县西。隋初废，寻复置，移今常德县治。唐置朗州，寻仍曰武陵郡，后又为朗州。”《辞海·地理分册》对武陵郡管辖范围作了界定：“武陵，郡名，汉高帝置。治所在义陵（今湖南溆浦南）。辖境相当今湖北长阳、五峰、鹤峰、来凤等县，湖南沅江流域以西，贵州东部及广西三江、龙胜等地。东汉移治临沅（今湖南常德市西）。其后，辖境逐渐缩小。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废，大业及唐天宝、至德时又曾改朗州为武陵郡。”由此可知，武陵郡始于汉代，废于唐代。从汉代设置武陵郡起，武陵地区一直是完整而稳定的历史地理单元。

最后，从经济地理看，学术界、旅游界和政界、商界已把“武陵地区”作为经济整体。早在20世纪80年代，党中央、国务院按照区域经济的同类性把武陵地区划为全国十八大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此后多年，武陵地区多次召开湘鄂渝黔四省武陵地区县（市）政府经济技术协

作会议、湘鄂渝黔毗邻地区民委民族工作协作会议和旅游局构建“武陵山旅游圈”研讨会议。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会同湖南省、湖北省、重庆市、贵州省政协从2004年至2007年、连续4年共同举办4次“中国武陵山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2009年，国家民委在黔江区主持武陵民族文化论坛，举办首届中国武陵山民族文化节，湘鄂渝黔毗邻地区政府、民委、文化局等部门领导参加会议。开展这些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求资源的共同开发利用。在学术研究方面，为了促进这一地区发展，湖北民族学院出版武陵地区民族教育研究丛书，黄柏权提出湘鄂渝黔边区全面合作的工作思路，张英提出构建湘鄂渝黔旅游协作区的旅游开发战略。专家、学者的研究和呼吁不仅为地方政府的合作提供智力支持，而且为形成共识起了催化剂作用。

综上所述：“武陵”是历史悠久的历史地理概念，至今已有2200多年历史。“武陵地区”是以武陵山脉为主线，多民族聚居的湘鄂渝黔四个省（市）毗邻地区，在地理环境、历史文化、民族文化、宗教文化、生态文化等方面有其共同特点。

（五）“武陵文化”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武陵文化”内涵丰富。“武陵文化”是指历代居住在武陵地区土家族、苗族、侗族、瑶族、白族、回族、仡佬族和汉族等世居民族共同创造的具有独特个性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的总和，是“多元一体”的区域文化，其来源是多元的和多根系的，包括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武陵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武陵地区各族祖先在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共同创造出内容丰富多彩、颇有地方特色的武陵文化，为“中国文化”增添华章。“武陵文化”内容丰富，浩如烟海。“武陵文化”与“中国文化”具有共性的有渔猎文化、农耕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科技文化、工艺文化、建筑文化、教育文化、语言文化、体育文化、宗祠文化、隐逸文化、地名文化、旅游文化、节会文化、康养文化和茶文化、酒文化、凤文化、虎文化等文化。

“武陵文化”外延宽泛。武陵地区独具个性的文化包括历史文化、红色文化、民族文化、民俗文化、宗教文化、旅游文化、城镇文化、医药文化等八大系列。武陵文化的内容以“八大系列”为主体，积淀大量的文物古迹、民族文化和生态文化等旅游资源。既是旅游发展的助推器，

又是经济发展的增长极。

“武陵文化”的基本精神是：包纳百川、勤劳朴素、崇文尚武、自强不息。

文化是经济的先导，是旅游的灵魂。打造“武陵山旅游圈”，必须开发利用“武陵文化”旅游资源，使其成为具有旅游功能的吸引物。

按照全国政协民宗委从 2004 年来连续四届牵头组织的“中国武陵山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形成的共识，武陵地区有五个明显的共同点：

一是山同脉。这一地区以武陵山脉为中心，北有长江的巫山山脉，西接云贵高原，南靠雪峰山脉，东临长江中下游平原，是一个完整的自然地理单元。

二是水同源。这一地区主要水系是沅水、澧水、清江、乌江四大水系，均发源于武陵山脉。

三是民同俗。2010 年末，武陵地区聚居土家族、苗族、侗族、瑶族、白族、回族、仡佬族、蒙古族和维吾尔族等 30 多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总计 1 234 万多人，约占武陵地区总人口的 40%，是典型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定居在这里的少数民族交往交流，民风民俗相互影响，相互渗透。

四是经济同类。这里环境相对封闭，与国内发达地区相比，生产方式相对原始，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生活水平相对贫困，是全国十八大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之一。

五是文化同质。按照民族学研究专家张正明的说法，这一带是中国一条独特的“文化沉积带”。据《汉书》记载，汉朝初年，朝廷改黔中郡为武陵郡。此后，历代朝廷都把这里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地理单元进行统治，使这一地区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

基于武陵地区山同脉、水同源、民同俗、经济同类、文化同质的特点，20 世纪 90 年代，曾有不少学者借海南建省和重庆设市之机，呼吁建立“武陵省”。

总之，“武陵文化”是独具个性的区域文化，具有中国其他区域文化不可替代的特质和价值。

二、武陵文化生成机制

“文化生态”由自然场与社会场交织而成。武陵文化的生成与武陵山

脉所处的地理环境以及周边民族文化的影响密不可分。考察武陵文化生成机制，应从地理环境、经济基础、社会结构三个方面加以整合。

（一）地理环境

地理环境是人类居住地区各种自然因素的总和，包括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自然地理环境主要指地形、地貌、气候、水文、植被等。人文地理环境主要指疆域、经济环境、民族、人口等。地理环境为人类文化提供物质基础，人类只能在顺应自然规律的情况下创造文化。每一个社会都处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之中，每一种文化的发生、发展都受到一定的自然条件的制约。地理环境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文化。只有把武陵文化放在地理环境中进行考察，才能准确地认识其发生、发展的过程及其特征。

地理环境对文化的生成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并从多方面表现出来。武陵山脉地处云贵高原向湘西丘陵过渡的大斜坡上，是地质史上的燕山运动造成的一系列褶皱山中的一支。武陵山脉长 420 公里，海拔 500 至 2 000 多米，最高峰梵净山海拔 2 572 米。主峰周围多是大山，兼有盆地、丘陵和峡谷。武陵山脉及其周围山系构成华夏腹地逶迤延绵、峰峦起伏的山区，即我们常说的武陵地区。这里崇山环绕，山高坡陡，峡谷幽深，溶洞众多，海拔多在 800~2 000 米之间。这里河流纵横，土地潮湿，有沅水、澧水、清江、乌江四条大河以及数以千计的溪流。这里气候湿润，降水丰富，气候垂直变化明显，属于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年均气温在 12~17℃ 之间，年降水量为 1 100~1 600 毫米，无霜期 3~8 个月，适宜动植物繁殖生长。这里地形多样，地貌奇特，旅游资源天下闻名。这里植被丰富，动植物种类多，数量大。武陵文化的生长和传承与武陵地区的地理位置有关。武陵地区位于中国腹心地带，不仅与中原地区相邻，而且又是进入西南地区的通道。所以，武陵地区历代就是各种文化的交汇点。武陵地区地理环境对武陵文化的生成及发展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民族学专家张正明在《土家族研究丛书》总序中指出：“中国的地形，从西到东，从高到低，大致可分为三级阶梯。长江上游与长江中游的交接地带，位于第二阶梯中段的东缘和第三阶梯中段的西缘。这里是连山叠岭和险峡急流，地僻民贫，易守难攻，历史的节拍比外围地区舒缓。北起大巴山，中经巫山，南过武陵山，止于南岭，是一条文化沉积带。”

武陵地区是这条文化沉积带的核心区，是历史文化的聚宝盆。武陵文化是多种文化的总称，文化的多样性、包容性是它的主要特点。武陵地区是个相对封闭的孤岛，又是我国东部和中原通往西南或者巴蜀通往东南地区的中介地，这种地理位置和交通地位给武陵地区历史发展留下烙印。武陵文化既是传统文化又是现代文化，包括名胜文化、红色文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建筑文化和歌舞文化等含有现代文化因子的特色文化。

（二）经济基础

地理环境影响文化发展，这种影响是通过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这个中介得以实现的。中国文化植根于农耕与游牧两种经济生活的土壤之中。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主题。古代中国的农耕经济有中原定居农耕方式与南方山地游耕方式两种类型。中国南方亚热带山地民族，直到近古甚至近代，仍然采用刀耕火种、采集渔猎的生产方式，他们迁徙不定。据《史记·货殖列传》载：“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无积聚而多贫。”《汉书·地理志》亦载：“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但是，他们的移动范围局限在武陵地区及其周边等南方山地，受汉族文化影响较大，故这两种经济方式不像游牧与农耕那样彼此争战不休。历代统治者对武陵地区少数民族设官治理，推行柔远政策，在唐宋时期设置羁縻州，在元明清时期设置土司机构和卫所机构，偶尔以武力镇压农民起义。

（三）社会结构

武陵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受到社会历史环境影响。文化是一种人类现象，而人类只有组成一定的社会结构，才能创造并且发展文化。人类社会组织的演变趋势是由血缘政治向地缘政治进化。中国社会结构虽发生过诸多变迁，但由血缘纽带维系的宗法制度及其遗存长期保留，这与中国人的主体从事聚族而居的农耕生活有关，使得中国跨入文明门槛以后，氏族社会血缘纽带解体很不充分。

宗法制度源于氏族社会父权家长制公社成员间的亲族血缘联系。宗法制孕育于商代，定型于西周。王位由嫡长子继承，世代保持强宗地位。嫡长子继承制和宗庙祭祀制度共同构成宗法制的基本内容。秦灭巴后，

武陵地区虽然纳入中央王朝统治，但因其大山阻隔，交通闭塞，不过羁縻而已。秦汉至唐宋时期，实际统治者仍是本地土家祖先向氏、覃氏、田氏、冉氏、彭氏、唐氏等强宗大姓的部落酋长，即《明史》所载：“历代以来，自相君长……大姓相擅，世积咸约。”由血缘纽带维系的宗法组织——宗族，长盛不衰，成为超越朝代更迭的社会细胞。酉水流域土家宗族的分支是以“房”为较大的单位。各大宗族有私田，也有以“房”为单位由祖先传下来的公田。公田的收益供同“房”族人公共活动之用。各个村寨在强宗大姓族长率领下，自成系统，组成社会团体，共同防卫村寨，维护地方秩序。武陵地区苗族经历过漫长的原始社会。唐宋年间，苗族逐步进入阶级社会。元明清时期，苗族地区封建领主经济已有发展。但是腊尔山区、锦江流域等地仍然处于农村公社末期，仍由“榔”和“款”的首领管理，集一村为小款、数十村为大款，有公众制定的“榔规”或者“款约”。各级首领皆由公众推举产生，拥有处理纠纷、指导生产、主持祭祀和指挥作战等职能。武陵地区侗族的“联款”或者“合款”是以血缘和地域为纽带的民间组织，是神圣庄严的盛会，大款为侗族的民族立法，小款为一村一寨的约法。这种社会宗法组织是魏晋时期以来由原始氏族转为农村公社产生的。

中国社会组织的特色，与宗法制度紧密相连的是君主专制政体，这一政体长期存在，直到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元明清时期，武陵地区建立70多个大、小土司。各级土司王实行专制制度，集政权、财权、兵权、司法权等诸权于一身，用政治控摄文化，维护中央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

“宗法—专制”社会结构与农业自然经济相辅相成，形成“伦理—政治”型文化范式，绵延久远，直至近代方有解体之势，然其深层结构继续传承不辍。

三、武陵文化基本特征

（一）武陵文化是历史悠久的文化

武陵文化源远流长。从旧石器时代起，武陵地区考古文化序列清晰可辨，如石门县燕儿洞遗址出土旧石器、泸溪县白沙村田溪口遗址出土旧石器。新石器时代文化更为密集，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在武陵地区都有分布。夏商周三代文化已达较高水准。

清江流域香炉石文化堆积共有 7 层，第 7 层距今 4 090 (± 100) 年，第 6 层距今 3 520 (± 130) 年，第 5 层为商代中期，第 4 层为商末至西周，第 3 层为东周时期。香炉石巴文化遗物包括石、骨、陶质的生产生活用具、兵器和装饰品，总计达 9 240 件。其中，出土的甲骨、卜骨在长江以南最为丰富，特别是以鱼的鳃盖骨作材料，是前所未有的。出土的兽骨和鱼骨、陶网坠在我国文物界是罕见的。澧水流域发现商周时期文化遗址 40 多处。酉水流域发现商周文化遗址 20 多处。三峡库区发现夏商周时期巴人遗址 168 处。春秋战国以后，武陵地区考古文化出现土著文化与楚文化、巴文化交融现象。鄂西南“相当于春秋战国阶段的文化遗址数量是很丰富的，其遗址中的文化内涵总体上仍是以陶器为主线”，“其物质文化的特征与主体当是以楚文化为主”。湘西州出土许多春秋战国时期古墓，舒向今认为这批墓葬为战国晚期土著民族墓葬，属于土著文化，绳纹圜底罐、平底罐、簋形器、圜底钵、假圈足壶便是这一时期土著陶文化代表，青铜文化代表是青铜短剑和铜镞。武陵山区发现许多战国古城。里耶古城震惊学术界，保存完好的凤凰古城表明武陵文化高度发达。

武陵地区不仅考古文化历史悠久，而且民间文化同样发达。土家和苗族都有语言而无文字，历史文化都用民族语言口耳相传。苗族的《古老话》和土家族的《梯玛歌》《摆手舞》反映人类起源、民族迁徙和社会生活情况，堪称创世史诗。另外，用民族语言传承的神话、故事和民歌构成武陵文化云蒸霞蔚的景观；民族艺术丰富多彩，傩愿戏、茅谷斯、摆手舞、跳马舞等记录了武陵先民生产生活，具有活化石价值；民间工艺精湛，土家族的雕刻、织锦、挑花、刺绣和苗族的蜡染、服饰、银饰及侗族的侗锦都是民族文化瑰宝；科技文化发达，采丹砂历史悠久，很早就用植物和矿物作染料；干栏建筑、鼓楼和风雨桥被誉为中国古建筑杰作；苗医、苗药声播海外；文人文学也很发达，诗人屈原的《九歌》《橘颂》等作品得益于武陵文化熏染，刘禹锡创作的竹枝词受到武陵民歌影响。明清时期，武陵山区更是人才辈出，容美（今鹤峰）连续出现八代文人群体，这在中华文坛上是罕见的。彭秋潭、彭勇功、彭勇行、唐仁汇、彭施铎、吴愈材等人的竹枝词既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也有很高的艺术水平。近代文人田星六、向乃祺、庾悲亚、田名瑜、袁吉六、吴恭亨、田金楠及当代文人沈从文、黄永玉、孙健忠、丁玲、邵华、汪承栋、胡柯、吴明仁、田岚、蔡测海、颜家文、杨盛龙和歌唱家宋祖英、付辽源、